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材料

[2021] 第 12 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专题）

2021 年 6 月

目录

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奋斗历程及启示	1
毛泽东《十年总结》与开创新局	10
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	26
全面建设时期邓小平探索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成果	44

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奋斗历程及启示

罗平汉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回顾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程，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鉴于中国原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直接走入社会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过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在生产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基础上，再将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 3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各类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地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

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 1952 年底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到 1953 年，抗美援朝取得了重大胜利，新解放地区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经过 3 年多的努力，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国营经济得以建立并起到领导作用，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的利用、限制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人民民主政权更为巩固。1953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

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从 1953 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5 年中共安排限额以上大中型企业 694 个，其中 156 项是由苏联援建的，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一五”计划实施后，全国掀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期间，建设了一批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工矿企业，生产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汽车，迈出了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步。

在国家工业化起步的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也顺利进行。在农业方面，早在 1951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我国互助合作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1953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到 1956 年 4 月 30 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到这时，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共有 100.8 万个，入社农户 10668 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90%，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从实践上看，在 1953 年以前，重点放在工业中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商业中的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1954 年到 1955 年底，是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发展阶段。195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工作会议，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原来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公私共有，转归国家支配。这时企业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了。1955 年底和 1956 年初，各地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到这一年的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 1956 年底，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

对于手工业的合作化,主要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 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 91.7%。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社会主义改造尽管也有一些不足,如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但在这样复杂、困难、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经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很大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和了不起的奇迹。

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956 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党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和主张,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经过几年的思想改造,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

告，其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次会议深刻总结我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从1957年6月8日开始，由于对形势作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之后，党的领导人试图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加快发展生产力，迅速改变中国经济

文化落后的面貌，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对建设社会主义急于求成，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1958年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过程中，全国人民以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干劲。但是，“大跃进”以高指标、“放卫星”为特征，严重脱离实际，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助长了瞎指挥和浮夸风，并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同时，由于高指标和浮夸风的影响，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之从1959年起，我国连续3年遭遇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

严重的困难使人们一度发热的头脑清醒起来。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于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开始好转。

在共和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全国人民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忘我工作，涌现出了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无数英雄模范人物。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石油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成了大庆油田，实现了原油和石油产品自给。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然而，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之际，“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严重地混淆了敌我，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因此，必须对其彻底加以否定。但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此期间，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广大工人农民仍坚守在生产一线，许多知识分子克服困难坚持科学研究，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产生的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从1956年至1976年的20年间，虽然曾走过弯路，出现过挫折，但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做了重要准备。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当时占世界人口 1/4 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没有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事业取得了重要进步，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实践的经验很少。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能是在摸索中前进，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就难免走弯路、出现失误。正因如此，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这些经验与教训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必须使生产关系的变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

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等。邓小平同志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从这个角度上看，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进行的探索，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来源：《机关党建研究》2019年第11期）

毛泽东《十年总结》与开创新局

王颖

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面对比较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对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自己的见解,号召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十年总结》以及在大会上的口头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和分析,反映了毛泽东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寻找出路、走出困局的基本思路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开创新局的不懈努力。

在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每走过一个历史阶段或每到重要关头,都要总结经验,为的是开创新局。今天,我们重读《十年总结》,学习研究其形成背景、思想内涵、影响意义等,仍然能够获得关于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统筹“两个大局”,进一步开创新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有益启示。

一、《十年总结》为的是扭转被动局面

《十年总结》,是在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补充过程中诞生的,是毛泽东在经济困难形势下反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和弊端的结果。

1955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15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同年10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12月,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

义高潮》序言,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

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和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的汇报,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关系问题发表讲话。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是我们党开始对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开始。但是,在反右倾的总思路下,毛泽东对建设速度仍抱有过高期望。

1957年,我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建设指标,并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这时,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又变得强烈起来。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农村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

《人民日报》1960年元旦社论《展望六十年代》宣布“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三年胜利实现。而实际情况是,到1960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一系列问题: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需要提供的商品粮数量猛增,粮食征购任务虽一再加码,但仍不能满足需要,市场供应紧张,农村和城市的缺粮状况日趋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到6月上旬,经济困难的问题开始大面积暴露。各调出省所调出的粮食仅完成了计划的一半,一些大工业城

市调入的粮食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北京存粮只够销7天,天津只够销10天,上海大米已无库存,天天告急。中央虽然屡次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但调出省本身也很紧张,难以完成调出指标。这样严峻的形势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所没有过的,也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年初没有意料到的。

1960年6月8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年到1962年)的补充计划,并讨论国际形势。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始料未及的困难,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早晨写出《十年总结》一文,印发与会同志,并在当天下午作了口头讲话。他试图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扭转被动局面,下决心降低计划指标,以便走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二、《十年总结》主要内容是对开创新局的思考

《十年总结》篇幅很短,只有约2000字,而新中国成立10年来,重整山河,除旧布新,从恢复经济到大规模建设,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方方面面工作,有无数治党治国治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的内容实在太多了。那么,毛泽东是怎样用区区2000字总结十年并展望未来了呢?

(一)以“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作为10年历史的线索

在《十年总结》中,毛泽东开门见山,提纲挈领,指出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成功经验就是“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他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

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毛泽东接着谈到了在“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过程中我们取得的成绩和造成的失误。他对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予正面评价,但也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较多、较严重。他写道:1958年“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毛泽东还比较详细地回顾了1958年、1959年两年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逐渐降到1300万吨的过程。他认为,钢产量指标经过大家的努力最终调节到比较符合实际的情况,但粮食、棉花生产的高指标依然没有降下来,“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

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10年的历史,就是“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的历史,就是通过反复实践,逐渐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

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

(二)剖析高指标、高速度的根源,重申实事求是的原则

为什么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呢?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给出了回答:“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毛泽东在当天的口头讲话中又对形而上学思想问题作了剖析:“也许有些同志不赞成,说实际工作中不要每一样都搞到哲学上面去,我也赞成,不是每一样都要搞到哲学上头去,但现在搞了那么多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累计起来打一个折扣就觉得可靠了。所谓片面思想,就是孤立起来看问题,就是形而上学。”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错误为例说明形而上学的问题,他说自己1959年同意3000万吨钢的指标和主张对“一平二调”的账可以不算,就是因为情况不摸底。毛泽东认为这一问题当时在党内具有普遍性:“你说只有我不摸底,你们管粮食、管棉花的人那么摸底?我看也没有摸。”

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意愿出发,孤立地看问题,盲目性也就成了必然,高指标、高速度带来的被动性也就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减少盲目性和被动性,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呢?毛泽东的回答很明确:“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希望全党立足实际,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去规定符合实际的指标和速度,去摸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一再重申实事求

是的原则,要求全党“按实际可能办事”。6月15日,他在将四份关于国际动态文件印发会议的批语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事物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发展的”,“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则是不可能的”。

(三)强调制定指标要“留有余地”,把握主动权

《十年总结》强调制订经济发展计划不但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要留有余地,应对意想不到的情况,把握主动权。“二五”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的多项指标,虽然经上海会议前期讨论已经压缩不少,但毛泽东还不确定其是否符合实际,他认为“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毛泽东特意在“实际”二字下面打了着重号。这时,毛泽东改变了过去的态度,高度肯定1956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这实际上是为“反冒进”平了反,为周恩来平了反。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二五”计划的不足:“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

留有余地是为了争取工作主动权。毛泽东强调:“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他解释了什么是主动权、如何获得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为什么要降低指标把主动权拿来呢?他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

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在这次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讲得最多的就是指标要留有余地。他说：“盘子还得要降，学习八大一次会议的那些经验，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奉劝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们，你们公布什么东西，总之搞小一点，做得多一点，说得少一点。”他分析了“留有余地”对“鼓足干劲”的促进作用：“我这样讲不是泄气，不是促退派，而是促进派，是为更好地跃进。不是纸头上、口头上留有余地，而是实际上真正留有余地，这个气就可以鼓，干劲有鼓的余地，不然干劲就鼓不上去。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毛泽东还要求经济建设重视质量，他说：“今年和今后两年的基本建设，盘子绝不可以搞得过大，数量不可不讲，但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格，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

在毛泽东的主张下，上海会议将“二五”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的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

(四) 承认失误，指出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在《十年总结》中，毛泽东不仅承认失误，提出亡羊补牢的措施，而且带头自我检讨，承担责任。他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〇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

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那么,如何看待过去所犯的错误的呢?毛泽东说:“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他认为正确对待错误的态度是吸取教训,改正错误:“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他进一步阐述:“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十年总结》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范围内,向党内高层首次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态度十分诚恳,表达了坚决纠正错误的决心,体现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襟和巨大勇气。

(五)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十年总结》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高度概括了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辉煌灿烂而艰难曲折的历程,基于“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的观点,毛泽东既肯定“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又深感“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他提出“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

务”。

毛泽东的话蕴含了三层含义：首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其特有的规律，不能再用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一套理论、方法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创造新的理论，找出新的方法。其次，过去我们太相信人的主观力量了，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最后，今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去调查研究，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利用规律，真正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写《十年总结》的真正用意在于探究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开创新局，如何走好第二个十年的路，走好中国未来的路。他在口头讲话中明确表示：“我写这一篇的意思，就是这么几句话：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主动多一点，被动少一点。”

三、《十年总结》启示我们“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十年总结》作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十年探索实践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晶，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一个重要文献。这些思考虽然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其中提出了不少正确的见解和观点，既对当时走出困境发挥积极作用，又具有长远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邓小平曾对《十年总结》作出过很好的评价，他说：主席这篇东西，我很赞成，需要总结一下。我看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如果说我们得到益处，恐怕就是这个。《十年总结》是全面的，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解决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

（一）“不断总结经验是重要的”

毛泽东历来重视总结经验，他曾风趣地说过：“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理论，指导实践，是毛泽东

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显著特点。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对“大跃进”以后出现的许多意料之外的困难和问题,毛泽东更是把总结历史经验摆在非常突出的地位。毛泽东在1959年11月底的杭州会议上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他说:我们革命,开始不知如何革法,想革而已,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得到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经验,所以不断总结经验是重要的。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他对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和经验教训,把关于我国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来总结。到了1960年6月的上海会议,为了全面降低计划指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于是,他写出了《十年总结》。在谈到这篇文章时他说:“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就是讲一点历史,因为不讲历史,就没有说服力。”毛泽东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认真总结,初步统一全党思想,重视并深化对客观规律的认识,逐渐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开始弄清大跃进症结之所在,找到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途径,不断掌握主动权,扭转被动局面。

在《十年总结》认识的基础上,后来毛泽东又把总结经验上升为实现人类创新的必由之路。1964年,他审阅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

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事业要兴旺,就必须不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开拓创新。对于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更应如此。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现在我们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第一个百年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开篇。时代呼唤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开拓创新。而开拓创新不仅需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大胆实践的勇气,还需要善于独立思考、善于总结经验、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只有围绕重大现实问题,科学深入总结建党100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才能准确把握大势,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推向前进。

(二) “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使之以崭新的先进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没有前人的经验,更没有现成的答案。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中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只能“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照搬其现代化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照苏联模式搞的。1956年苏共二十

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弊端,毛泽东因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怎样“以苏为鉴”“少走弯路”、创造中国自己的道路问题。从此,毛泽东就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寻找一条反映中国实际、适合中国的、比苏联模式更好更快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一路上充满艰辛,始终伴随着曲折、失误、迷惘、困惑,但这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最正确的选择。在《十年总结》中,毛泽东以“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作为贯穿总结历史、认清现实、展望未来的线索,抓住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和核心。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我们党领导人民,先后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成救国大业;找到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道路,完成兴国大业;找到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完成富国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正在探索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旗帜决定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100年艰苦奋斗所开辟和拓展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复兴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利益,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毫不动摇走下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道路可以引导所有民族实现发展振兴;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三)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勇于改正错误,把握工作主动权,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在当时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因为刚刚进入新中国的人们怀着过去的惨痛记忆,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十分强烈。而在遭受客观规律惩罚、陷入被动之后,毛泽东首先冷静下来,写了《十年总结》,承认失误,提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有主观热情不行,还要遵循客观规律,要通过调查研究去发现规律,然后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十年总结》后,毛泽东关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特殊规律的思想不断深化。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告诫广大领导干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其规律,对这个规律的认识要经历一个过程。他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

这些观点是毛泽东带头深入反思的结果,反映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品格,敢于推翻自我、逆流而行的勇气和化被动为主动的智慧。这是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创者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领导人民围绕社会主

义建设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的发展将不断向人们提出更多的新课题,中国道路的探索仍将继续。在新时代,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科学运用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认识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趋势和根本特征,才能准确识别每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和主要矛盾,把握主动权,根据时与势的不同而灵活调整,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只有“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抢占科技等领域制高点,勇于开创新局,才能在世界大发展大调整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不懈奋斗

毛泽东领导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设想以更快的速度、更大更高更纯的公有制形式,让国家富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结果事与愿违,因脱离了实际,国家经济陷入困难,人民生活贫困。这时,毛泽东深深体会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不易,进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时,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随后,他在《十年总结》中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960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谈到提高中国

人的生活水平改善问题,他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这和他在 1960 年年初时设想的“1962 年赶上英国,1967 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已经完全不同。

总结吸取“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调整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当前,我国已取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成就,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来看,我们还有很多困难和挑战需要克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依然存在。面临复杂深刻的内外部环境变化,新时代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因已取得的成绩而骄傲自满,也不能因害怕困难而止步不前,更不能因畏惧失误而无所作为,而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懈奋斗,努力开创新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总之,毛泽东的《十年总结》既是对党实践探索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党理论思考的创造性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创新局、引领未来的成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品格。在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们重温这篇重要文献,领会其核心要义,可以更加清醒地看待过去,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1 年第 1 期)

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

高长武

关于 1953 到 1956 年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一种观点认为其改早了甚至就没有必要进行，质疑和诋毁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重大历史意义。那么，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真的是改早了、没有必要进行吗？并不是这样。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是中国历史和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内在发展趋势，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社会主义改造的构想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是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后才临时提出的，而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已确定的奋斗目标。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怎样实现革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呢？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实践和思考。1939、1940 年之交，毛泽东在持续思考的基础上接连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把握和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弄清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进而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步走”战略构想，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

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也就是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关于提出这一构想的依据以及“两步走”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毛泽东作了详细阐释。他指出，中国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这两个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前途的社会主义为前途的，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后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

“两步走”的战略构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基础性内容。正是在这一战略构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制订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纲领和具体方针政策，指导和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按照“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当第一步

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实现后，自然就要考虑转入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因此，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落实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确定并一直坚持的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构想的具体举措。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启动

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构想确定的方向是十分明确的，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转变，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呢？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进展而不断调整的。

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对这一问题作过初步规划，指出全国革命胜利后，党的一个根本任务是要稳步地促进“两个转变”，即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但具体到在何种条件下、从何时开始、以何种方式实现这样的转变，党中央从当时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现实和面临的革命形势与任务出发提出过一些设想。但此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国民经济的恢复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客观形势的快速发展变化超出了原来的预期，据此党中央对这一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判断，调整和完善了原先的设想。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党中央有条不紊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军事领域，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剿灭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势力，到1951年5月，随着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

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状态。同时，面对不期爆发的朝鲜战争和美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威胁，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抗美援朝，并经过艰苦斗争，最终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空前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在社会领域，广大的新解放区陆续开展土地改革，废除封建把头制度、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取缔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旧社会丑恶现象，镇压和平息反革命势力的捣乱和破坏，分别开展遏止党政机关腐败浪费风气的“三反”和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在经济领域，及时没收官僚资本，组建和壮大国营经济，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打击投机商人捣乱市场的不法行为，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努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经过短短三年多的努力，长期战争的创伤得到初步医治，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顺利完成，国民经济也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城乡人民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新生的人民政权不断得到巩固。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6%，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3%；按可比价格计算，1952年的国民收入比1949年增长69.8%；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人均社会总产值1952年是1949年的174.53%，逐年递增20.4%。

同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内部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因素稳步增加。这突出体现

在两大方面：一是随着国营经济建立起来并快速发展壮大，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发生了根本变化。国营经济不仅控制了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产业部门，而且在与其他经济成分的比较中优势不断增强。至 1952 年，在全国工业（不含手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比从 1949 年的 34.2% 上升到 52.8%，私营工业从 63.3% 下降到 39%；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国营商业占比从 1950 年的 23.2% 上升到 60.5%，私营商业从 76.1% 下降到 36.3%。这些数据变化反映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得到显著增强，这就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二是这期间国家在调整工商业过程中采用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把相当一部分私营工商业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在整顿金融秩序、抑制通货膨胀过程中实现了全部私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在已经进行了土改的广大农村开展了相当范围的互助合作，所有这些措施都一定程度上体现和反映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性质和内在要求，使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加。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到 1952 年底，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不仅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而且生产关系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已居于领导地位，非社会主义因素已不断受到限制和改造。可以说，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在这种形势下，党中

审时度势、应势而为，及时调整和完善了原来的认识和设想，于 1953 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可以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已经完成、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以及国民经济成分中社会主义因素显著增加等改造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和达到的情况下开始的。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

实现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标和理想，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必然要求。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工业化呢？自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和思潮都给出过答案，也进行过种种努力，但统统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就是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封建主义的自救和维新、资本主义的改良和革命等各种主张和方案都解决不了旧中国面临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性课题。最后解决这一课题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答案，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考虑到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必须首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从而为实现工业化、过渡到社会主义扫清障碍、打下基础。

那么，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国民经济也已恢复的情况下，怎样实现工业化呢？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幻想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就能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是从资本积累方面看，新中国不可能走靠压榨本国人民和掠夺海外殖民地获得原始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而只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内部积累，集中有限的力量和资源有计划地建设一些重点项目，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带动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是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自身力量来看，由于长期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特别是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力量薄弱，其劳动生产率低、扩大再生产能力小，长期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根本不能担负起领导实现工业化的任务。

三是从农村的情况看，当时我国广大的农村虽然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一定时间内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 2000 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小农经济经营规模小、资金少、生产工具落后、抗风险能力弱等劣势和缺陷，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大规模的工业化对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是

根本不能匹配的。

四是从外部环境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严密的封锁、围堵和遏制，新中国在外交和贸易方面只能采取“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在实现工业化方面的高速度和取得的显著成就，对急需改变落后状况、努力实现工业化的新中国而言，自然具有十分现实可靠的示范作用。

而新中国经济恢复后国民经济中出现和积累的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充分表明，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正确选择。这些矛盾和问题突出体现为：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城市和工业大规模建设需求旺盛与农村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供给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工业化的推进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国家要集中有限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开展有计划的重点项目的经济建设，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性则要求其扩大自由生产和自由贸易来发展自己，农村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则满足于自给自足，这样有计划的国家建设与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另一方面，即使是民族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在与国家的矛盾面前，愿意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但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能力、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户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应能力都十分有限，也根本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有计划建设所需要

的一些工农业产品和原材料。

这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影响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考虑原来设想的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调整既有的方针政策，采取新的方针政策，争取早一点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展工业化建设。这样一来，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自然提到了工作日程上来。历史地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应对和解决我国国民经济中积累和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为实现工业化开辟正确道路的必然要求。

四、当代中国发展的政治和制度基础

按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从 1953 年开始，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陆续开展起来。到 1956 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的私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分别基本上转变成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和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这时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达到 92.9%。可以说，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等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经济基

础的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等也相应地基本形成了。除此之外，这期间，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巩固和完善，以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为特点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实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也建立起来。正是基于这些，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比较顺利地创造性地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避免了大的经济破坏和社会动荡，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意味着几千年来社会生产资料被少数统治阶级占有并借以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这就使人民民主专政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作为保证，能够形成全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有效团结，为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为现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并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开辟了广阔而

现实的道路。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成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经过长期努力，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实践已经充分表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和竞争中显示出了显著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当我们在回顾辉煌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时，一定不要忘记，今天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前提下和制度基础上取得的；一定不要忘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及时进行并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功绩。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就确立不起来，而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确立，就不可能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奠定坚实基础，进而也就不可能后来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后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今天的历史性成就。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这其中的关键词就是社会主义，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五、亟待厘清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深刻把握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关系原理，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必然性，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关系的原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上去认识和把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充满着各种性质和形式的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及其内在规律，从根本上决定和支配着人类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演进和更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其主要内容概而言之就是，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适合和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要求，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束缚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及其性质和变化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会通过“保护自己”或“排斥异己”的方式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通过巩固和变革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

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往往是十分复杂的，所以运用这一原理认识 and 解决相关问题时，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坚持辩证的历史的态度。正如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的：“虽然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也就是说，在理解和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关系的原理时，既不能陷入到机械生产力论、庸俗生产力论中，单方面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不能陷入到唯心主义、主观主义中，脱离具体实际地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我国 1953 年到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以辩证的思维、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关系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问题的一个光辉的成功典范。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这里仅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在当时或过后对如下三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这样一个侧面作出一些分析和阐释。

其一，既然新中国成立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党

领导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能不能由此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的社会现状长期保持下去，不作任何改变，从而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没有看清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方向，幻想长期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样一种本身就具有过渡性质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状态，犯了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和无视事物的永恒运动和发展变化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实际上，当时党中央通过认真研究和分析，对这一趋势看得很清楚，并给予了深刻论述和回答。1953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宣部制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作出了明确界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着”，“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增长并将获得最后的胜利，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至消灭”。党的领导人围绕这一问题也分别作了阐发。毛泽东指出，“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周恩来则指出，“集中地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进一步作了回答和分析。他说，“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有一些人希望永远保存这种状态，最好不要改变”。“这究竟是否可能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想要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此路不通”。“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其二，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但生产力依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即着手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背离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搞早了？

答案也是否定的。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全面准确理解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弄清楚决定作用不能简单等同于先决作用。对这一问题，毛泽东曾给出过深刻回答。他指出：“虽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新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

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以资本主义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并不是说必须等到生产力已经充分发展到足以与新的生产关系完全相匹配时，才能确立新的生产关系。在具备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变革和调整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片面强调生产力决定作用、忽视生产关系反作用的观点是典型的机械生产力论、庸俗生产力论。对这种论调，邓小平后来在谈到经济落后的国家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作过有力批驳：“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

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因此，在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并不是单线、孤立起作用的，它只有与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结合起来，从而二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相互作用，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

其三，在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加强和巩固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必要注重经济方面的改造和建设？或者说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掌握着政权，是不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就不需要进行了？

当然不能这样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主要是没有搞清楚以至割裂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辩证关系，夸大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对此，1953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49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总结发言时也回答得很清楚。他指出，“为什么要着重提出经济改造？因为经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不得到改造，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总之，经济是基础，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100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

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也就是说，在特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可以在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形成时率先构筑起来，但如果仅仅是停留于此，不主动地进行经济改造从而确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那么，已经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是难以持久的，迟早要崩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党中央从 1953 年开始坚定地在全国领导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制定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临时才提出来的革命任务，也不是改早了，更不是没必要改，而实际上，它是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在进行中，中国共产党就公开提出的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的题中之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已经形成进行经济改造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辩证统一关系原理，顺应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我国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必然要求，应对和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中积累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做出的慎重而关键的重大历史性决策。此后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伟大成就，已经充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必要的、必然的，也是正确的、不容诋毁的，其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显现出来。

（来源：《观察与思考》，2021 年第 8 期）

全面建设时期邓小平探索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成果

杨胜群

从 1956 年党的八大召开到 1965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十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党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日益陷入“左”的错误，但一直是一边犯错误一边纠正，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仍取得了很多积极的成果，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务实、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为他后来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本文拟对此作一较为系统的梳理。

一、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 1956 年筹备和召开八大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获取的一个十分宝贵的思想认识。1955 年下半年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逐步显露，促使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经验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一方面给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震动和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揭开了斯大林的大盖子，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破除对苏联和苏联经验的迷信，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提供了思想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内，一时间形成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讨问题的风气。

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问题至为复杂”的大西南主政两年十个月，调中央工作后又长期分管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的工作，非常了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实际情况。在参与筹备召开八大的过程中，他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听取经济部门汇报等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他不仅在1956年上半年同朱德等赴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弊端有切身的感受；而且又在下半年同刘少奇等再赴莫斯科协助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对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经验带来的恶果有切身的感受。这些，使他对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更清醒和坚定的认识。1956年11月17日，也就是在中共八大闭幕后不久，他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指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并且指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邓小平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6年11月17日。）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符合中国实际和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此在邓小平的思想上扎下了根。

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应不拘一格

1956年苏共二十大特别是波匈事件，暴露出社会主义的“丑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冲击，也对人们已有的社会主义观造成严重冲击。在中国，波匈事件的发生是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行不通？成为人们思想上最大的疑惑。1957年1月12日，邓小平应邀到清华大学为师生作报告，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对此作出解答。他说：“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当说，我们现在的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是适合的，是好的。”他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作了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不是完善的”，还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基本制度”要通过恰当的“具体制度”和方法去实现。关于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他主张不拘一格。他说：“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监督和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什么制度合适，就采取什么制度。”怎么样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呢？他指出：“重要的是应当对那些正确的要坚持，对那些错误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记录，1957年1月12日。）

这是在中国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邓小平对中国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思考，成为他的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改革观的基本观点。“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后来则成为体现他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名言。

三、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1958年开始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邓小平是少有的坚持运用这一基本原理分析问题者之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铺开，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左”的错误的症结之一，就是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主观随意地拔高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形式。被认为是人民公社样板的河北省徐水县，最早宣布实行全民所有制。1958年10月，邓小平在徐水县视察时提出，生产关系不要搞得太纯，“除了全民所有制外”，还要允许“小集体”。接着他在云南视察时明确批评：“现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徐水县搞清一色全民所有制“那个办法行不通”，要照顾“个人、集体、全民的关系”。（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5日。）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纠正浮夸风、“共产风”和基层干部工作方法上的错误，并涉及到纠正混淆全

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界限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就“什么是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发言指出，“实现全民所有制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总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生产水平”。“人民公社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58年11月7日。）他批评一些地方宣布实现全民所有制言过其实，因为他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

由于连续两年大面积自然灾害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影响，到1960年冬全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决定从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7月，邓小平赴东北调查，实际情况更使他感到调整要从党员干部的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明确提出要纠正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错误。他在听取哈尔滨市工作汇报时指出：“我们就是超越了阶段”，“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搞这样高的”。并说“今后主要讲社会主义好了”，“一切都要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不要再照顾原来说过的话”。（邓小平在听取哈尔滨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的谈话，1961年7月22日。）

四、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哪种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选择哪种生产关系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割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片面地从生产关系上理解社会主义原则，陷入“唯生产关系论”，在生产关系上折腾来折腾去。1961年进

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后，邓小平和陈云等开始深入思考从生产关系上调整农村政策的问题。1962年3月底，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如何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时说：“原则是哪种办法见效快就用哪种办法，不要拘泥于形式”，“不要担心个人多了，集体少了，无非是百分之十几，这里出点富裕农民也不怕”。（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3月29日。）

七千人大会后，一些地方农村摸索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引起争议。1962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7月2日。）这就是后来有人概括的“猫论”。之后，他又将“猫论”进一步展开，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的“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24页。）他的这一思想主张，使当时党内探讨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思想和气氛更加活跃。

邓小平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这一时期提出的变革农业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思想主张，虽然在不久后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否定；但是，作为探索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成果，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邓小平上述思想观点，特别是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生产关系要多种多样的思想，成为十多年后中国改革的思想源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邓小平当年调整和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具体思路。

五、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要打破平均主义，让农民富起来

人民公社实行穷过渡，在所有制上拔高为全民所有制，在分配制度上也实行接近按需分配的生活资料供给制，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1958年11月，人民公社化运动刚铺开不久，邓小平在贵州考察时就对此表示怀疑，他说“还得有差别，还得有按劳取酬”。到1961年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开始后，邓小平南下调查进一步认识到调整不只是降低钢铁指标等，还要从人民公社体制上进行调整。3月，他在四川成都考察人民公社时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只简单靠政治挂帅”，“没有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还是不行的”，并且分析说：没有按劳分配，就不能各尽所能，就调动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29日。）这时，打破平均主义最主要的是要限制供给制的比例直至取消供给制。邓小平南下调查后，又于4月份和彭真到北京郊区农村作调查。5月10日，他和彭真给中央提交的《关于北京郊区农村调查报告》中

明确指出：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坏处很多”，废除供给制“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6 页。）

打破平均主义，即意味着收入分配上出现差别，而这正是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所不允许的。邓小平不仅认为应当有这种差别，而且提出了“让农民富起来”的政策思想。1961 年 1 月 5 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刚从西藏考察回来的中央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的汇报。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政策要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户富起来”，“让农民家里有存粮，牛羊多点，修点房子”。并且说：“农民富要放在一家一家上，不要放在一团一团上。”（《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3—244 页。）

在当时的情况下，邓小平明确提出“政策要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户一家家富起来，是非常可贵的，这实际上是他关于农村政策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十多年后，他领导和推动农村改革，初衷还是为了让农民富起来，农村改革的政策还是从“富农”开始的。

六、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资本主义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农村生产成了自给性生产模式，物资大都实行统一调拨，商品交换和资本流通在很多地区基本上被取消。这不仅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活力，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是这个问题比较早的发现者之一。1958年10月，他在云南视察时指出，农业生产“总是要有交换的”，“要千方百计使交换的东西增多”。（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5日。）不久，在11月上旬召开的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主持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至一九七二）》时，特别重新改写了原第三十六条的内容，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在讨论这一修改时，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系列意见。12月9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指出：“我国目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国目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在国家经济领导下进行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12月9日。）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指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现实必要性，而且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性质。

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进入新时期之后，我国改革开放最早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

是从这一突破开始，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当年毛泽东、邓小平等提出的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思想主张，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源头。

七、制订经济建设的长远规划，要以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为中心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大跃进”搞“以钢为纲”，犯了与苏联重视重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的同样的错误。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在指导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就是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关系摆正了。邓小平这方面的思想认识尤为明确。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革命胜利后搞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几亿人口的吃、穿、用。”（邓小平在中南局、华北局小组会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19日。）到下半年，经济调整取得初步成效，国家计委即研究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补充计划和1963—1969的七年规划。邓小平要求后两年补充计划要搞“过关”的指标。“过关”的指标不是以前那样的高指标，而是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的指标。同时，他指出：制订七年规划，要真正按照农、轻、重为序来安排，以基本解决人民群众吃穿问题及日用品问题为中心来规划各方面。（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0月24日。）他还说：“总的规划原则核心是解决吃穿用，部分解决住，兼顾国防，围绕这些计算钢、煤生产多少。”（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

年11月21日。)这里，他把吃穿用与钢的位置调了一个个，是要使正在制订的规划真正成为以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为中心的规划，这同以前的“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计划相比，出发点和立足点都不一样了。

由于经济调整的任务重，发展情况不明朗，七年规划的制订被搁置下来。到1962年，国民经济趋向好转，计划编制工作也回归常规。国家计委考虑例行地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提出按照“首先解决吃穿用的原则”来安排国民经济。因此，三五计划被称作“吃穿用计划”。尽管后来由于形势发生变化，大家对制订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但以农业为基础和重视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的基本思想理念并没有改变，并且对实际工作还在产生重要影响。

以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为中心制订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不仅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符合中国基本国情。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新时期，邓小平设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目标，第一步就是解决温饱问题，让老百姓吃饱穿暖；第二步实现小康，主要还是要让老百姓吃穿用更好一些，而且还要住得更好一些，生活环境更好一些，等等。

八、搞经济建设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违反群众意愿的“大呼隆”群众运动

八大以后，邓小平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样，希望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邓小平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比作“给自己出难题”，因此在“大跃进”之初，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但他深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需要条件，不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出难题要“不是空想的，是合乎实际的”，“要有雄图，心是热的”，“但也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心要热，头要冷”。（邓小平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3月25日。）当“大跃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严重后果日益暴露后，他便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并义无反顾地倾力于配合毛泽东纠“左”。

这一时期，邓小平领导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能快则快，不能快的就不让快。我国的石油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而石油工业对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又特别重要。邓小平分管石油工业，在对石油工业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提出石油工业“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超越国际先进水平，世界先进水平也不是高不可攀的”。（《邓小平同志与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回忆邓小平》（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页。）在他的领导和决策下，石油工业战线选准突破口，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发现和建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特大油田——大庆油田，使我国石油工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在同一时期，铁道部向国务院提交报告，提出现有铁路三万公里，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新修建二万公里，在十年内修建十八万公里新线。这

样的速度是明显脱离实际的。邓小平在审定报告时，将这一提法修改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新建线路能否由原定的一万五千公里增加到二万公里的修建计划，以及能否在十五年内修建十八万公里，须由国家计委在综合研究之后，加以审定”。

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发展速度适当加快不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仍坚持了经济发展能快则快的思想主张，总是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大跃进”运动中，高指标往往伴随着一哄而起的“大呼隆”的群众运动，既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又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教训太深刻了。1961年底进入调整时期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经济建设不能搞违反群众意愿和群众路线的“大呼隆”群众运动。他说，经济建设“要扎扎实实，因地制宜，不要搞大呼隆”。他还对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作了辩证的分析，指出“群众运动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能天天、事事搞运动”，“过去几年讲大兵团作战，我看不是群众路线。‘大呼隆’违反群众意志，群众是勉强、被迫接受的，只是形式热闹”，“有些群众运动往往不合乎群众路线，违反了群众路线”。（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2月11日。）

九、经济建设要搞一套管理制度，农业有农业的“宪法”，工业有工业的“宪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建设更多地是学苏联的经验，尤其在工业企业管理方面照搬了苏联的一些办法。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开始摸索建立自己的制度体系，邓小平是积极强调和推动制度建设的领导人之一。1957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社会主义工业企业要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和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在“大跃进”运动中，工业企业的生产责任制和经济核算等制度废弛，普遍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大幅降低。邓小平中肯地指出：“根本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制度和纪律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0年12月22日。）这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对于明确政策、加强人民公社的管理起到了明显的作用。邓小平提出，工业也要搞一个类似“农业十二条”的“宪法式”的文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农业六十条”）后，邓小平又指出，农业方面搞了“六十条”，“工业方面也要拿出若干条”。后来，他主持制订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运动以来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企业管理的一系列正确的指导原则和具体规定，成为当时克乱求治、整顿工业企业的指导性文件，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关于企业管理的章程。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个文件对加强企业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工业宪法”。

在主持制订“工业七十条”的同时，邓小平还主持制订了“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等一批工业、文教、科技方面的条例。这批条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重要的制度建设成果，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中产生了积极作用。邓小平把这些条例称为各行各业的“宪法”，突出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后来直至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十、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生活中个人选择的自由，不应越来越小，而应越来越丰富

社会主义社会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所揭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上搞“清一色”的同时，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上也搞一律化，完全忽视、抹煞人民群众生活中个人选择的自由。邓小平在“大跃进”刚兴起不久，就对此表示怀疑。1958年10月，他从东北考察回来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人们有啥吃啥，穿衣也简单。统统清一色好不好？”（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58年10月6日。）不久他去西南考察，在同贵州省委负责人谈话中又说：“公社吃住等一律化，共产主义是越搞越简单，还是越搞越复杂？”（邓小平在贵州考察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11月2日至5日。）从西南回来后，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人民公社还不能搞纯全民所有制的同时，还明确指出：“集体生活中的个人选择自由，从社会主义

到共产主义，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邓小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1958年12月9日。）对这个观点，邓小平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这样谈到已是不容易的。

十一、党的领导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原则

邓小平参加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搞个人崇拜给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危害，感受很深。他在中共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联系斯大林和苏共的教训指出：“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9页。）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从1957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开始，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陷入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风气日盛。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错误迅速蔓延开来。1960年3月，邓小平在天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有针对性地谈到坚持集体领导原则的问题。他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在当时的情况下，邓小平这样强调党中央集体领导，提出要合乎

实际地评价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作用，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这实际上触及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正是由于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后来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个人崇拜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导致“左”的错误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正是从努力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入手，全面拨乱反正，使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源：《党的文献》）